

中国现代性建构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

苏星鸿 杨雅瑞

摘要：中国现代性是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其建构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紧密关联的。中国现代性建构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要求，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实践结果。作为成长中的现代性，中国现代性在新时代新征程需要不断建构，由此决定人类文明新形态需要不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中国现代性建构的产物，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理想目标。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国现代性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706(2023)02-0020-08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发生的最为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就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中国现代性建构过程中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中国现代性建构、中国式现代化以及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之间具有内在统一性，都是中国共产党推动“两个结合”的实践产物，都是为了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厘清中国现代性建构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之间的内在关联，对于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研究至关重要。

一、中国现代性何以建构

现代性作为一个非常复杂而且充满歧义的概念，往往被人们用来描述现代社会不同于古代社会的本质特征。狭义上的现代性特指现代社会的人们的心理结构以及对此形成的价值判断，广义上的现代性是包括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要素共同构成的复杂整体。从一般意义上讲，现代性有一些共同的规定，比如说经济上的市场经济，政治上的民主政治，价值观念上的个人自由，发展动

基金项目：2022年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2022YB067）；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专项（党的二十大精神研究）“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

力上的科学理性，交往特征上的世界历史，思维方式上的复杂性思维，等等。从特殊意义上讲，现代性必然与不同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语境相关联，因而，现代性必然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由此导致现代化也是多样的而不是唯一的，人类文明是多样的而不应该是单一的。虽然现代性以及现代化都是西方社会历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产物，但是西方世界无法垄断现代性的定义权和解释权，每个文明主体和或者民族国家都可以根据自身现代化的经验，来修正或者充实现代性的基本内涵、理解范式和阐释方法，因此，正如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一样，现代性也不等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搞清楚这一点是中国现代性构建的前提性条件。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现代性建构一度沿着资本主义现代化路径展开，历史证明这是根本行不通的；因为中国现代性建构不是自然而然设定的规划，也不是照搬西方国家为中国提供的现成模版，而是中国人民发挥历史主体性的实践运动，是历史赋予中国人民需要争取的权利，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性探索的产物。20世纪初，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中国人民自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现代性构建提供了科学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的中国共产党，为中国现代性构建提供了必要领导主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中国现代性构建提供了基本实践基础。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我们逐步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束缚创造了社会主义现代性，进而逐步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制约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使中国现代性建构走上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现代性建构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从国际背景看，中国现代性建构是在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背景下展开的，西方现代性从理论上否定了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从而也否定了中国现代性建构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同时，西方现代性从实践上排斥中国进入现代化进程分享现代化带来的红利，这就否定了中国现代性建构的资格和身份，最终否

定了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国内背景看，在阶级基础方面，由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没有能力领导旧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无法摆脱近代中国发展的依附性和中华民族发展的弱势地位。要实现中国独立自主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必须依靠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要依靠代表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时，在民族心理方面，经济政治的弱势地位决定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陷入文化自卑的境地，传统文化无法开出应战西方现代化、进而能够引领全球现代化发展的思想文化资源。因此，选择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走出一条与西方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努力建构中国自己的现代性，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实践逻辑。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而言，既要学习西方又要超越西方，这是中国现代性建构需要解决的内在矛盾。中国现代性建构是在继承资本主义现代性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展开的，同时又要克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弊端，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历史性超越。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现代主义者，首先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高度赞扬。但是，与西方现代主义不同的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现代性虽然给人类带来进步，但是由于它造成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分裂、历史发展和自然发展的断裂、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割裂，因此，注定要被更高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现代性代替，虽然这种代替是在承继资本主义优秀文明成果基础上进行的，但是由于两种文明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因而必然是一种断裂式的代替。这种断裂式的代替意味着西方中心主义的终结，意味着以资本主义为定向的世界历史向以共产主义为定向的世界历史转变，意味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同时，与西方思想家把现代性等同于西方性并把其看做是历史的终结不同的是，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现代性看作是人类发展的特定阶段，将其创造的文明形态归属于人类文明的史前期，在此阶段真正的现代性尚未展开，真正的文明形态尚未生成，因为真正的现代性应该而且必须是向非西方国家开放的，真正的文明形态应该而且

必须是建立在人类立场上的。可见，马克思主义现代性不仅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反叛和超越，而且包含着对共产主义现代性的规划和建构，具有面向历史的纵深性、面向时代的开放性和面向未来的人类性，是指向真正共同体的现代性思想文化资源。惟其如此，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现代性建构的重要思想武器，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的行动指南。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相结合的复合型命题。在理论创新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思想都是接着经典马克思主义往下讲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本质特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思想资源。在这些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建设、改革不同时期的实践创新，把欧洲版的社会主义发展为东方中国版的社会主义，即把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构想变为在东方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现实，极大发展了马克思晚年提出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内在互动，彰显出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独特路径。

中国现代性是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其建构注定要进行一场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定向的社会革命，以此实现从资本主义现代性到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历史性转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2]。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仅仅是这一转折的第一步，此后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意味着这一转折的历史性完成。从世界历史看，这一转折的实现离不开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离不开指导这一革命成功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在十月革命开启的世界历史新纪元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武器并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通过“两步走”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不仅确立了中国现代性建构的身份和资格，实现了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第一次飞跃，也使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踏上了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人间正道。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现了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新的飞跃，即从传统社会主义现代性到现代社会主义现代性的转型，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即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两个大局”内在互动中创造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现了中国现代性建构新的飞跃，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因此，可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就没有中国现代性建构，就无法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就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内在逻辑。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何以创造

中国现代性建构是一个总体性叙述，从宏观层面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创造了由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共同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从中观层面看，就是现代国家、现代民族、现代社会的建构，创造了由文明型国家、文明型民族和文明型社会共同构成的现代文明形态；从微观层面上看，就是现代人的建构，创造了不同于传统社会依附性和资本主义社会原子式人的现代人。这三个方面共同构成具有总体性叙事逻辑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这里重点从中观层面上展开分析，同时兼顾宏观和微观层面，以全面揭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必然结果。

国家层面的现代化建构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政治任务，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的政治使命。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由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封建制国家逐步变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失去了领土的完整和政权的统一，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尤其是中国失去了自己独立的主权，国家处于蒙难的发展境地。如何把中国由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变成一个高度统一的国家，如何实现中国独立自主的发展，如何实现由传统的帝国向现代共和国的转型，这是国家层面的现代性建构必须解决的重大政治问题。不可否认，这个层面的现代性建构包含着救亡，或者说是以救亡为前提的，为此，就必须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新中国和旧中国相比较，不仅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名称不

同,而是在国家政权的性质上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人民由受剥削和受压迫对象转变为国家的主人,国家性质实现由资产阶级专政向人民民主专政的转变,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实现由资产阶级共和制向人民代表大会制的转变,国家治理实现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人民当家作主对于国家层面的现代性建构来讲,就是以社会主义为定向的政治文明新形态的建立。当然,这只是一个前提性的政治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用法律保障人民的各项民主权利得以实现。就此而言,国家层面上的现代转型仍然是个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因为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尚未最终实现。国家层面现代性建构的结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的生成。中国的崛起是文明型国家的崛起^[3],我们追求的现代化强国是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以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协同发展为诉求的文明型强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强国,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是面向新百年在国家层面现代性建构的新任务。

民族层面的现代性建构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历史任务,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的历史使命。在民族历史的发展阶段,中华民族为人类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的民族性处于积极乐观状态。在世界历史的发展阶段,中华民族饱受灾难和屈辱致使文明蒙尘,我们的民族性处于自卑焦虑状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视野中,民族层面的现代性建构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引领下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同时又是其不断走向世界并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过程。在世界历史视野中,民族层面的现代性建构是受压迫的中华民族要变为独立的民族,我们民族的自卑心态要转变为自信心态,这不仅仅是中华民族自身解放的问题,而且是所有被压迫民族团结起来,推翻作为压迫其他民族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问题,因为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对外扩张过程中,把资本主义内部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转化为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殖民地

以及半殖民地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在东方落后国家表现为西方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非西方落后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因此,民族层面的现代性建构实质就是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体系走上民族独立发展道路,进而实现民族复兴并为人类发展做出贡献。在此背景下,对于中华民族的现代性来讲,历史地被纳入了帝国主义时代民族解放的总问题之中,同时又必然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族解放事业提供丰富的中国经验,并把他们团结到反对帝国主义民族压迫的历史潮流中去,形成反对帝国主义民族压迫的国际统一战线,这种民族现代性建构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世界历史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毛泽东创造性地把马克思阶级分析的方法运用到民族矛盾分析上,通过民族层面上的现代性建构,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民族自觉基础上实现民族自信和民族自强,使中华民族以高度的文明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定向的伟大社会革命实现的民族解放本身就具有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的世界意义。民族层面上现代性建构的结果就是中华民族文明新形态的建构,其最终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社会层面的现代性建构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社会任务,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的社会使命。中国传统社会是重群体轻个体的家国同构社会,这种社会的优势具有高度的整合性和凝聚力,但是这种社会相对于个人来讲具有消解个体自我意识和抑制个体主体性的固有局限,在高度的社会整合中形成了抽象掉个体性的纯粹“集体”主义,不仅使个人的自我意识难以彰显、独立人格难以完善、历史主体性难以发挥,而且也使群体意识、民族特色、社会共识和人类关怀难以在反思性批判中实现应有的历史自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视野中,社会层面的现代性建构不同于中国传统社会高度“集体”的群体主义,也不同于资产阶级倡导的纯粹个人主义,因为这种个人主义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群体主义是背道而驰的,与中华民族群体意识觉醒以及国家认同塑造的时代要求格格不入,与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真实共同体的本质要求相去甚远,因此是不可能为

我们所接受和认同的。社会层面的现代转型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群体价值和个体价值如何在保持合理张力,使每个中国人的文明素质以及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素质都有明显的提高。对此,唯一可行的方案就是个体必须摆脱依附性以及原子式的存在,以社会性的存在融入到其所隶属的阶级,通过阶级意识表达个体意识,这时的个体才能真正成为历史发展的主体力量。相应的对于全体而言就是摆脱血缘共同体以及“虚假共同体”的存在,以真实的自由人联合体包容个体的存在和发展,为个体的发展创设各种有利条件,因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4]社会层面的现代性建构的结果就是超越中国传统社会血缘共同体和西方社会“虚假共同体”的真正共同体社会,这个社会是具有积极人格和共同理想的社会,政党就是这个社会共同利益的代表。中国共产党是具有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政党,以伟大的自我革命推动整个社会实现社会革命,成为社会层面现代性建构的光辉榜样,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以及和谐世界建设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三、如何继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现代性建构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统一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一项未竟的事业,要求我们在

新征程实现中国现代性建构新的飞跃,继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此,需要在现代性社会和现代性人的良性互动和协同发展中,使中国现代性建构取得新的飞跃,使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再上新的台阶。

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是一个重大革命命题。无论是从民族层面、国家层面还是从社会层面的启蒙来讲,都依赖于政治革命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首要任务是实现政治解放,即在实践层面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及其文明形态进行批判和颠覆,创造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理论层面上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及其文明理论进行反叛和颠覆,创造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

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以无产阶级专政为核心概念、以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为主要目标、以政治解放为主旨的革命话语系统。在这一话语系统指导下,以新中国的成立为标志实现了民族独立、国家独立和人民自由,使中国现代性建构具有资格和身份,并确立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的历史基点。值得指出的是,革命话语作为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的核心话语,现在并没有过时。对待革命话语,不是抛弃的问题,而是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如何创新的问题。新时代新征程要取得新的伟大斗争的胜利,需要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继续保持斗争态度,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否则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就会迷失方向和丧失主动权,中国现代性建构就会丧失自己的主体性以及“自我宣言”“自我辩护”和“自我证成”的自信力,人类文明新形态也会失去应有的文明自信,其“术语革命”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是一个重大建设命题。政治解放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前提和基础,社会解放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目的和归宿。没有社会解放,任何层面的现代性建构都难以最终完成。因此,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建设实践相结合,对中国社会进行彻底改造以实现社会解放。这里所说的社会解放是广义的社会解放,即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以及人等层面的现代化,展开中国现代性的全面建构,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虽然这种努力后来被“左”的错误思潮打断,但是也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提供了物质基础、宝贵经验和制度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中,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为价值理念、以建设为核心概念、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基本诉求的建设话语系统。在这一话语系统指导下,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了中国现代性建构由传统社会主义现代性到现代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新飞跃,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即人类文明新形态。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在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同时，更加努力地为人民谋幸福和世界谋大同，以实现人类的解放。“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5]为此，我们不仅要建构符合当代中国发展的建设话语体系，同时要建设符合全球化的时代潮流、有利于人类持久和平和共同发展的建设话语体系，凸显中国现代性建构的人类价值，彰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历史意义。

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是一个重大的文明命题。本质地看，由政治解放为主旨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系统到中国式现代化为基本诉求的建设话语系统的转变，仍然是中国现代性建构中的外在性转变而非内在性转变。因为无论政治解放还是社会解放，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认为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应该从属于人类解放，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最高目标。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真正目的在于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人的文明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核心，没有人的文明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当然，人的文明发展不是孤立存在的，需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等文明形态的配合和支撑。为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中，形成了以“五大文明”为核心概念、以文明型国家、文明型民族、文明型社会、文明型政党为基本内容、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为目标、以社会文明和人的文明全面发展为主旨的文明话语系统，把人的解放和人类的解放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的最高诉求。在这一话语系统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过程中实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的新飞跃。中国特色文明话语是对西方文明中心主义的批判和否定，有利于破解人类现代性的各种困境和难题，有利于克服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促使人类文明沿着和谐共生的方向向前发展，因此，这一话语需要大力弘扬和创新。

由革命话语和建设话语向文明话语的转变，是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的内在性转变。在此转变过程中完成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向人类解放的转

变，才意味着现代性建构历史使命的真正完成，才意味着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目标的达致。为此，在实践层面必须实现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向文明力量的转变，同时实现阶级意识和社会意识向人类意识的转变，这两大转变是中国现代性建构最为实质性的要求，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最为关键的变量。因此，在理论层面必须正确处理革命话语、建设话语和文明话语之间的关系，既不能把三者完全对立起来，也不能把三者完全割裂开来，而是把科学有效的革命话语和积极务实的建设话语融入文明话语中，实现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术语革命。固然，改革开放前革命话语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一定束缚，以政治建设代替其它建设，以阶级启蒙代替人的全面启蒙，一度使中国现代性建构走了弯路，使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深受影响。但是这不应当成为我们否定革命话语的原因，而是应该成为我们今天运用革命话语的深刻教训，启迪我们要合理运用革命话语而不是放弃革命话语。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来，我们在坚持革命话语积极方面的基础上，建构了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基本诉求的建设话语，建构出具有主体性、开放性、创造性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现代性，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确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人在继承革命话语和建设话语的基础上，建构起具有中国指向和人类关怀的文明话语，表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中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理论，特别是以人民为中心、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全面从严治党等核心话语，凝聚着中国现代性建构的不懈探索和恒久追求，蕴涵着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的生动智慧和成功方案。

四、人类文明新形态何以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理想目标

新时代新征程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阶段，这是中国现代性建构产生新的飞跃的历史阶段，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世界历史意义全方位展示的历史阶段。因此，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

理论自信诠释中国现代性，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人民实现自我认知的重大时代任务，是向世界阐释中国现代性实现文明认同的重大时代挑战，也是凸显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人类现代性建构理想目标的重大历史使命^[6]。就此而言，从整体性揭示中国现代性建构真实图景，从内在逻辑揭示其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包括的人类文明发展基因，具有必要性、重要性、紧迫性。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理想目标，在于其自身具有的合法性、正当性和有效性。

就合法性而言，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基于中国现代性建构而产生，中国现代性是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决定了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理想目标的合法性。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站在人类社会的立场上，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市民社会立场进行了深刻批判，提出建构以人类社会或者社会化为立场的共产主义现代性，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明形态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新形态，这是符合人类文明发展基本规律的合法结论。在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扬弃，自觉地站在人类社会立场上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种文明形态的本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它是尊重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基础上的产物，具有人类文明理想形态的真理基因。马克思现代性思想通过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资本逻辑的本质批判，提出建构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最高诉求的共产主义现代性，这是人类文明发展价值的合法诉求。在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和人民至上的理念，自觉地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它是以实现无产阶级解放、人类解放和人的解放为最高追求的文明新形态，其本身蕴涵人类文明理想形态的价值基因。就此而论，人类文明新形态占据了人类文明真理和价值的双重制高点，其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理想目标是毋庸置疑的。

就正当性而言，现代性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

的，中国现代性是对西方现代性的扬弃，其生成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现代文明形态，具有代表着人类文明理想目标的正当性。比如，在物质文明新形态方面，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的物质利益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以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价值目标，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与西方以资产阶级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和个人权利为中心的个人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不同，实现了社会权利与社会责任均衡发展，公有资本和私有资本的竞争发展，国家的“有形之手”和市场的“无形之手”的协同发展，因而在国家、社会和企业之间保持了合理张力，既发挥了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市场对资源的高效配置，又防止了资本无序扩张对社会侵蚀或政府干预；既防止了国家权力对市场的无效干预，又防止了资本对国家政治和社会公平的侵蚀，在解决政府和市场以及公平与效率问题上具有正当性。比如，在政治文明新形态方面，对内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实体民主和过程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结构民主和功能民主的有机统一，是最真实、最管用、最有效的普遍彻底的人民民主政治；对外坚持尊重国家政治道路和政治模式的自主性，坚定不移地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弘扬中华民族“协和万邦”的政治文化传统，尊重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国际政治基本原则，是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创新性的普遍有效的人类民主政治。这种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作为人类政治文明形态的最高表现，对于实现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政治权利都具有重要实践价值，其政治正当性是无法否定的。在人类精神文明新形态方面，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和西方价值观优秀思想的综合，实现马克思主义自由精神、中华民族德性精神和西方文化理性精神的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是破解文化的现代性差别和冲突的中国智慧，是对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底色的“普

世价值”的超越，对于促进中西现代性的对话沟通和相互理解至关重要。另外，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建构为内容的人类社会文明新形态，以美丽中国和清洁美丽世界为目标的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同样具有作为人类文明理想目标的正当性。

就有效性而言，虽然人类文明新形态正处于创造中，在一些方面尚未充分显示出其潜能、力量和特征，但是其主体要素、基本功能、基本特征和基本诉求已经生成，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效果清晰可见。不断开放发展的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拓展，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快速增长的城市化或城镇化水平，不断完善的现代工业制造体系，日益完善的以科学创新为重点的国家创新体系，使得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超过30%，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在造福中国人民的同时造福世界各国人民；始终坚持国家政治的高度自主性和开放性，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中真正实现了绝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始终坚持国际政治的高度民主性和法治化，成为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及维护世界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的中坚力量；始终倡导和而不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等价值理念，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主张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为破解人类文明发展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社会文明建设方面，中国成功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解决了历史上长期没有解决的绝对贫困问题，建立快速增长和较为完善的国民知识教育体系，全体人民的文明素质又很快很大的提升，在经济快速增长奇迹的基础上创造了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在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建设方面，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变化，走出了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生态现代化道路，为人类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促进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同时呼吁各国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7] 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积极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倡导“一带一路”，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重大而积极的贡献。总之，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新动力，拓展了人类文明发展道路，塑造了人类文明发展方式，改写了西方文明中心主义的世界文明格局，以其超越西方文明的先进性和对人类文明发展贡献的有效性贡献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理想目标。

历史和实践证明，人类文明新形态因其具有的独特世界意义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值得追求的理想目标，这是中国人民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新理解和深刻回答，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建构人类文明新秩序和谱写人类文明发展新篇章的重大贡献和重要主张。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3-24.
- [2]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47.
- [3] 张维为. 中国震撼[M].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6.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71.
- [5] 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8-05-05.
- [6] 万俊人. 用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诠释中国现代性[J]. 理论导报，2012，（9）：58.
- [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74-275.

作者：苏星鸿，兰州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
杨雅瑞，兰州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钟晓媚